

THE TEN OUTSTANDING
THINKERS OF THE
MODERN WORLD

威廉·詹姆斯

弗里德里希·尼采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爱德蒙德·胡塞尔

马克斯·韦伯

伯特兰·罗素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卡尔·波普尔

让-保罗·萨特

尤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世界
十大思想家

K815.1
Y551

易杰雄 主编

现代世界 十大思想家

THE TEN OUTSTANDING
THINKERS OF THE
MODERN WORLD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01 号

书 名 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

编 著 者 易杰雄主编

责任编辑 吕 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5.25 插页 2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1000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366—5/D·233

定 价 44.8 元(精)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三年前,我所主编的《世界十大思想家》出版,由于部头比较大,定价亦不低,我曾担心此书很难销售。意想不到的的是第一次印的6000余册不仅很快卖完了,两年多来又重印了三次。不久前第四次印出的10000余册也很快售完。最近又在第五次印刷。它还荣奖1989~1990年度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第五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二等奖。台湾买了它的版权。新疆人民出版社已着手以蒙、哈、维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北京晚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以“《世界十大思想家》风靡海内外”为题报道了它受社会欢迎的情况。这一切确是我们原先所未敢企求的。

《世界十大思想家》一书所以会受欢迎,我并不认为仅仅由于我们作者把书写得有多好,尽管我的合作者基本上都是研究有关思想家的博士、教授,而且他们都写得非常认真。真正的原因而在于它适应了社会的需要。

众所周知,“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所走过的是这样一条路:鉴于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和由于在分配方面长期吃大锅饭,大家没有积极性,眼看再不改革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的

情况,于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始改革。我国的改革是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经济领域的改革又是先从经济最落后的农村开始,农村还是从最贫穷的山区开始,实行包产到户,联产计酬,实行生产责任制等等。收到明显效果后再推广到平原,在全国农村推广。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城市接着开始搞。先是小城市和中等城市,然后发展到大城市。城市改革也是小企业、中型企业开始,逐步扩大到大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入,矛盾暴露出来了:光搞经济领域的改革,不搞政治领域的改革,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无法进行下去。于是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问题,提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增加透明度,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等等。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刚刚起步就遇到了严重的阻力。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波,引起了人们——从普通老百姓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普遍反思:改革10年,几乎人人都承认国家发展速度加快了,人民的生活普遍有了很大的改善,政治上也较过去民主、自由了不少。既然这样,为什么还爆发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大政治风波呢?为什么人们吃上了肉,喝上了酒,看上了彩色电视,反而骂起娘来了呢?我们的改革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还有哪些问题?这时,我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入到思想领域。

与此同时,东德、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等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权力,社会制度也纷纷改旗换帜。特别是搞了70多年社会主义,并以社会主义各国首领自居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大厦在顷刻之间也倒塌了,执了70多年政的苏联共产党竟被人家兵不血刃地就解散了。这究竟是因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究竟还灵

不灵、还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究竟行得通还是行不通、是科学还是乌托邦？

总结自己的历史教训需要理论，理解苏联、东欧历史事变的过程也需要理论。人们除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外，还需要从先贤们那里吸取智慧。我想，也许这就是《世界十大思想家》出版后受到社会欢迎的根本原因。

继《世界十大思想家》出版之后，应江苏人民出版社之约，又一次欣然组织人马编撰《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这与我近十多年来的思想认识发展直接有关。

1978年，我国理论战线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后来又展开了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所有这些，都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解放、推动作用。实践标准的确立，给长期禁锢我们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正是由于有了它，才有了尔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生产力标准的确立也是一样，它恢复了一切社会变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的正确思想，为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但同时我也发现了它们作为理论问题，作为科学命题，也有不周延的地方。特别是由于它们本身还有片面性，而又被当作绝对正确的东西，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如在强调实践权威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在强调生产力标准的同时，也出现了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视得不够的问题。

诚然，社会进步归根结蒂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富裕程度。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要的物质前提。但是，生产力水平高了，人民的生活就一定好吗？人就能得到自由的、全面的、协调的发展吗？不一定。人类历

史上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生产关系的问题。即由谁来和如何支配、使用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的问题。有一个在经济基础之上一旦形成在这个问题上就能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制度的问题。显然，单纯的生产力标准只是从最终意义上讲才是正确的。如把它具体运用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在一定程度上太过分注重经济，而忽视了政治的作用。有人因此认为，社会进步的标准是社会政治制度。持这种看法的人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归根结蒂不过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它是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前提的。如果生产力水平低下，即使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建立起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关系，确立了进步的社会政治制度，如不能迅速提高生产力，使人民得到实惠，这种制度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的。

生产力提高了，政治制度也是好的，人民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自己完全有权自由支配，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能促进国家更快地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健康吗？就一定能保证人的自由地、全面协调地发展吗？如果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表明，创造历史的主体本身还有一个思想、文化的素质问题。这证明，无论是把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还是把国家政治制度的先进程度单独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标准，都是片面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社会进步的客观标准呢？人，至少是社会上大多数人，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满足的程度，他们自由的、全面的、协调的发展程度，才是社会发展水平的唯一客观的标志。因为这个标准不仅包括了生产力的水平和社会政治制度进步的程度，还包含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和人自身思想文化素质的高低。它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综合。此外，这个标准还

比较好地反映出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始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而不是相反，人仅仅是手段、机器上的螺丝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或建立某种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

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满足的程度，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协调的发展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客观标志。把人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还体现了人既是目的本身，又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统一。人本身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但同时，人，人民群众又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使自身不断获得解放的手段。所以，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有全面发达的社会，就必须有素质很好的人。要推动社会迅速地向前发展，就必须在提高人的素质上下功夫。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者实际上被忽视。

由于在社会制度一定的情况下，领导人的优劣也会使社会生活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如唐太宗是“明君”，所以有“贞观之治”。而隋炀帝是“昏君”，所以社会动荡不安。这种所谓“明君”与“昏君”的情况，又是由统治阶级内部嬗变自然出现的，这就容易使人寄希望于所谓的“明君”。“明君”是好于“昏君”，但只要制度不变，这种好——无论是对社会发展，还是对于老百姓生活的改善，就都只能是很有限的。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它就如一台运转着的机器，“君王”不仅是这台机器的操作者和管理者，而且也是这台机器本身的一部分。如他不按这台机器的运行规律运行，他就会被这台机器甩出去。人类历史上不少皇帝被废，都是因为因此而被搞下台、被监禁，甚至遭杀戮的。例子举不胜举。

人民经过理想一次次幻灭的痛苦最后认识到,关键是要用好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坏的落后的社会制度,以法治代替人治。这种认识较之于用“明君”代替“昏君”自然是进了一大步。因为不同的制度、不同性质的政权,特别是用人民的政权代替人剥削人的政权,对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发展,确有天壤之别。所以,争取以好的更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腐朽的制度的斗争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认识停留在这上边仍然是不彻底的。首先,好的制度、好的政府是哪里来的?还不是由于有素质高的人民通过斗争粉碎旧的、落后的制度建立起来的!其次,新的、好的制度,即使由于少数先进分子利用某些特殊条件建立起来了,没有素质高的人民群众的维护和发展,也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还有一点,正如恩格斯所深刻地指出的,任何腐败、昏庸、无能、恶劣的政府,“尽管恶劣,它仍旧继续存在,那末,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① 这证明,人的素质是最主要、最根本、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没有高水平的生产力,有了素质很高的人民,就会把它创造出来;没有先进的政治制度,有了素质很高的人民,就能粉碎旧的、阻碍社会发展的腐朽制度,创立起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来。推动社会进步,最根本的还是要放在提高人的素质上来。尽管这项工作不可能像用“好领导人”代替“坏领导人”和改变社会制度那样很快地就能收到明显的效果,但却是一项基础性工作。

人的素质包括很多方面:道德修养、文化水平、思想觉悟、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6页。

劳动技能、抽象思维能力等等。我通过研究中国近代发展的道路发现，理论思维能力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多么重要！而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显得又是多么地不够！

从认识的形成来说，当然是先有实践，后有认识。但从认识的指导作用来看，方向则相反，是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再到实践过程中去。不用说，在实践过程中原有构想中不切实际的地方会得到纠正，正确的东西也可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丰富。对于社会科学方面的认识来讲，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又表现为先解决政治问题，后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欧洲的历史十分清楚地展示为这样一条路线——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爆发的文艺复兴运动很快席卷整个欧洲，历时几百年。接着在法国又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启蒙运动。这些都是波澜壮阔、深入持久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批判旧制度、旧思想，为新制度的诞生探索道路，寻求方法，制造舆论，教育和发动群众。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才出现了尼德兰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才出现了法国反反复复几次大革命。这时，欧洲的资产阶级运动才由思想进到了政治实践。资产阶级夺得政权，初步站稳脚跟之后，为了取得人民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大力发展经济。于是先后爆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其他各国的工业革命。这时，欧洲资产阶级运动由政治实践又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实践。此后，欧洲资本主义各国虽然也曾遭到多次经济危机，但从总体上看，就走上了—条相对快速发展的道路。

而我们中国呢？由于理论思维能力不高，就在很长时间内未找到这条从思想到政治、再到经济的道路。

鸦片战争的失败，震动了中国的朝野。许多志士仁人都纷

纷要求维新图强。可是,怎样才能使国家迎头赶上去呢?由于理论思维能力不强,他们在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时,只看到人家是洋枪洋炮,而我们只有大刀长矛。就没有看到,人家之所以有洋枪洋炮,反映了人家有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人家之所以有较高水平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由于在当时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的资产阶级掌了权。而新兴的资产阶级所以能掌权,是由于有了长期的思想、理论和舆论工作准备,有了受到教育的素质比较好的国民。从而进一步总结出,要想社会飞速进步,就应从思想、理论准备和利用舆论教育、培养、提高人民的素质开始,接着是夺取政权,然后再抓经济建设。既然只看到我国的失败就是由于没有洋枪洋炮,解决国家强盛问题的方略自然就是搞洋务运动了——从西方引进近代工业,一头扎进经济,企图在不触动旧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由于缺乏两个前提——思想运动和政治革命,洋务运动注定要失败。事实也果然如此。你要建立海军,可慈禧太后却要把这笔费用拿来修建颐和园以供自己玩乐。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粉碎了洋务派的迷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才认识到,光搞经济领域的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经济领域的改革就行不通。于是出现了“戊戌变法”。企图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制。所谓君主立宪,无非是说,你当你的太上皇,我来承包,搞好了功劳是你皇家的,搞糟了,可拿我问罪。至少还保住皇族许多特权。显然,这是一种改良。这充分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可就这样,封建势力还不干,结果“戊戌变法”可日而终,变法派的人物中有许多人被杀或逃亡。连支持变法的皇帝也被软禁于瀛台。改良的路行不通。这时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才进一步领导了辛亥

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就是他们也仅仅到推翻帝制、引进西方的民主共和制为止，没有认识到，欧洲中世纪前后共几百年，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就搞了好几百年。而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的任务该是多么的长期和艰巨呢！由于辛亥革命缺了这个环节，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尚未有多大的提高，所以封建制度很快又在中国借尸还魂：袁世凯称帝，张勋扶植溥仪复辟。尔后，军阀像走马灯似地换演着一幕幕丑剧，虽然换掉了大清的招牌，可专制的实质仍丝毫未改。

由于我们缺乏理论思维能力，没有认识到要社会飞速发展，首先应从思想开始，批判旧制度，打碎旧思想的禁锢，为发展探寻正确的道路和方法，教育和动员群众，然后进行政治革命，最后再深入到经济领域。中国从鸦片战争一直到“五四”运动的80年间，始终未走上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正确道路，从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在近代变得越来越落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先解决思想问题，从而发动了“五四”运动：批判中国的封建思想，宣传西方的思潮。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对辛亥革命的补课。但不管怎样，在中国总算开始了批判旧制度、教育国民的思想运动。但不久，由于日寇的入侵、国土沦丧，民族救亡图存，一时又理所当然地挤掉了思想启蒙。本来在赶走侵略者、建立起新中国之后可以也应当继续把它进行到底。可是，由于我们对批判封建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重要性估计不足，胜利后并未能有意识地把反封建的思想斗争这一任务摆到重要位置上来，致使封建思想至今还是我们向现代化道路迈进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谁想得少,谁犯错误就多,谁进步就慢。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我们中国,由于理论思维能力不强,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一再地走的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路,因而多走了不少弯路,努力不少,成效甚微。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 同样,一个国家要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科技革命时代尤其是这样。

我国之所以搞经验主义,一再地走摸着石头过河的路。从思想根源来说,与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特征有关。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聪明的,但聪明和智慧主要表现在具有很强的感性直观的能力上,表现在凭直觉正确把握事物的能力上。之所以这样,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

一是我国深厚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儒学是辉煌的,值得我们自豪的,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有意义的东西。但从总体上说,它毕竟是人类早年的思想成就。它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基本特征还是凭感觉和直觉从总体上把握事物。尽管这种对自然和社会的把握不乏正确之处,但从总体上看,还具有原始的素朴的性质。它虽然有时能正确地把握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但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因而也不可能把总画面完全看清楚。

而长期以来,这种儒学思想又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捧到吓人的地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容许任何人在思想上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对它有任何偏离。这就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抽象思维能力在中国的发展。

二是市场经济机制在中国长期未能形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向人们提出具有很高、很复杂的抽象思维能力的要求。而西方有些国家之所以整个民族哲学素养都比较好,与他们在经济领域早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千变万化、需要通过非常复杂的思维才能把握其规律和趋势的市场有关。

三是长期以来,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比较低,对于包括主要肩负发展抽象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来讲,要解决的还是温饱问题。亚里士多德曾十分正确地指出过:“只有一切必须的东西都具备以后……人们才开始谈哲学。”这也是中华民族哲学素养提高不快的重要原因。

四是中国封建统治时间过长,这期间根本不容许有不同思想的产生。对有不同看法的人总是实行残酷的镇压。如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的深文周纳、魏晋时代的非所宜言、唐朝的罗织经、清朝的文字狱,直到国民党时代还搞文化围剿。整知识分子,整有不同看法的人,那朝那代都未断过。仅清朝的乾隆年间(乾隆在位共63年),制造的文字狱就有130多起,平均一年两起还多。被整的人轻则丢官、遭贬,重则不仅引来杀身之祸,有的还导致满门抄斩,甚至株连九族。这种对待好思考、有不同见解的人的残酷政策,把人搞得不敢想,不敢讲,严重阻碍了抽象思维能力和求异思维在中国的发展。此外,封建统治者从价值观上推崇“大一统”、听话、藏愚守拙,也影响了人们求异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还有,长期以来,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断了与世界各国包括哲学科学在

内的各个方面的交流,这对中华民族思维能力的发展也是很不利。

五是15~19世纪,在欧洲,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生了分门别类地收集、整理材料并加以研究的情况,即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使人们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展。这种方法后来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上之后,就造成了特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这种思维方式有严重缺陷,但它确实使人们对事物的细节的认识大大深化了。“它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在人类认识史上,它确实大大推进了人们分析问题和进行推理的能力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思辨水平的提高。而在中国的科学史上,由于并未明显地发生这类情况,而且在近代,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渐渐落后了,没有能为中国人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养分。

六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影响,同时经营实业的比较少,绝大多数人都是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有的不能直接当官,就为那些当大官的人当幕僚或食客。这就使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依附于权力,很难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自己要保住饭碗,甚至还想过得好些,有所进取,就必须看主子的眼色行事。主子感兴趣的,就顺着主子的意思大加发挥;主子不喜欢的,就不说、不想。这就使敏锐的感觉能力和直觉事物的能力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咀嚼概念、术语,玩弄逻辑,通过分析和推理来把握事物本质的这种抽象、思辨的思维能力,因为它表面上看起来远离实际,所以就不可能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也是在中国未能出现康

德、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的重要原因。

现在,党和政府在社会科学方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大胆探索,各抒己见。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形成,与各国各个方面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传统文化中消极作用一面的影响也正在逐步缩小。一言以蔽之,以往阻碍中华民族抽象思维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有的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有的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向人民介绍大思想家是如何思考的,对提高国民的抽象思维能力就有了重大意义。

努力提高国民的理论思维能力,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继《世界十大思想家》之后,欣然接受江苏人民出版社之约,组织编写《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的任务。

确实,思想家生活中那些最具魅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们头脑中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使你为之倾折的思想。除了科学探索、新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过程,可以说,他们没有别的传记。思想家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理论思维能力特别强的人。他们的传记对提高读者的理论兴趣和理论思维能力无疑是有助益的。何况,传记体本身较之于专门的理论著作可读性强,这对于不是专门从事理论工作,或对理论接触不多的人,尤其足于此。加之我们懂得,只有愚蠢的教师才是奉宣真理,真正是理的最员庭出足真重教会读者以探求真理的方法。所以,我们不仅要写出他们的主要理论成就,而且要尽可能地挖掘出他们是如何发现这些

思想的过程。这就可以使读者比直接读他们的理论著作在理论思维训练方面更能受到启迪。

一个个划时代的大思想家,就犹如矗立在人类历史上的一盏盏航灯。是他们指明了人类历史的航程。所以,他们公正地受到了人类永久的铭记。

一个大思想家,不管他本人意识到与否,他们的思想成就都是前人思想成果的合理的继承和发展,是根据他所处的时代的要求对当时现实所作的一种正确的概括与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本人都是时代的产儿,他们的思想成果都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的精华。按顺序系统地阅读人类思想史上大圣哲们的思想传记,就可以使我们懂得人类的思想认识是怎样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到今天的。从而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今天应该考虑什么,走怎样的历史必由之路。

黑格尔在谈到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时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议论:“手段是比外在的、含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锄头比锄头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却是暂时的,并会被遗忘。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却是服从自然界的。”列宁在读到这段议论时,因黑格尔猜到了生产工具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做了摘录,并在旁边打了着重号,批了“注意”二字,并作提要道:“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萌芽”,“黑格尔和历史唯物主义”,^① 给予了很高

① 参看列宁《哲学笔记》,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2页。